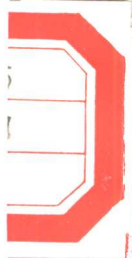


•CHONG QING KANG ZHAN CONG SHU•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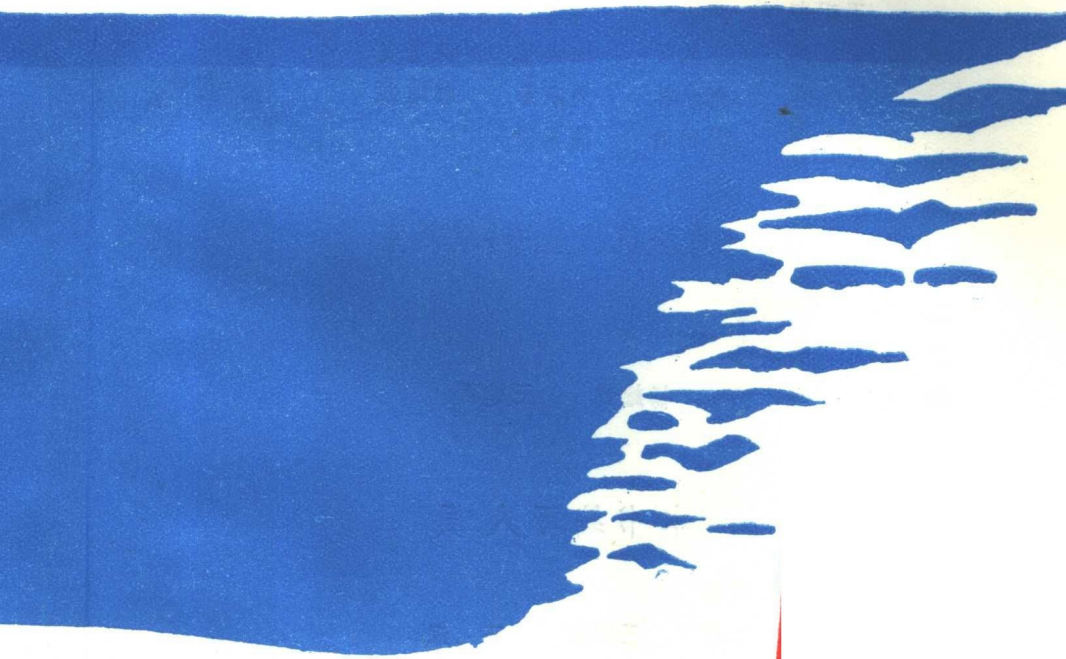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周宗贤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王明湘 刘立群 王泓编著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重庆抗战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九宫庙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插页6 字数154千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7年5月 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01-4.000

*
ISBN 7-5366-3175-8/K·167

定价: 9.10元

出版说明

一、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振兴重庆服务，特编纂出版《重庆抗战丛书》（下简称《丛书》）。

二、《丛书》属学术性著作。它立足陪都重庆史实，联系全国抗战形势，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层次的研究，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既可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参阅，又面向社会，供广大读者和海外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三、《丛书》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国民参政会、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军事、兵器工业、防空、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对外交往以及陪都人物、陪都遗址和大事记等16本专著。

四、《丛书》的年代断限，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止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某些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史实，可适当将时限前展或后延。

五、《丛书》的开本为大32开，数字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注释一律采用脚注。

六、《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协重庆市委和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中共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日报社、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教学、科研人员与专业干部。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襄盛举的成果。

序

《重庆抗战丛书》，是重庆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一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书。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据我所知，最近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单位也将有一批抗日战争的专著和资料出版。其中《丛书》并且不止一部。在抗日战争过去50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热潮。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由不止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须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历史常有巧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不能自拔。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共42年。那中间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们都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进行了17年，屡起屡仆。日本军国主义却在这个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并进而分裂华北。中国真正临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个严重形势下爆发的。八年抗战的过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过程。在那以后四个春秋，中国人民一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紧接着又跨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关。时代接连不断地迅速改变面貌，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回顾甲午战争以来

10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八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伤巨痛，累累血污，也看到了它的倔强挺立高大的灵魂；不仅看到了旧中国如何死死拖住历史前进的后腿不放，也看到了历史如何促使人们觉醒，加速把旧中国变为一个新中国。

重庆在抗日战争中政治环境独特。它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则是在重庆进行与展开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蒋介石的会面和谈判。抗战期间，重庆本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有研究整理出来，供人了解的价值。谈论抗日战争，少不了要讲重庆的种种活动，就像少不了要讲延安的种种活动一样。历史给予了这两城市极大的光荣。《重庆抗战丛书》一系列研究专题和资料，涉及不少领域，具有特色。人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去认识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怎样为后来新中国的降临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把全国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了。许多地区，不分前线与后方，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史实值得笔之于书。有了它们，就有了我们全民族这场惊天动地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全貌。《重庆抗战丛书》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它是我们望到的以地区命名的第一部大型历史书，不是这方面仅有的一部书。

刘大年

1993年5月4日

自序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大多在重庆设有办事处，以便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联系，报告军事情况和办理军需后勤事项。这诸多驻重庆办事处中，唯独没有公开挂牌的八路军（即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最出名，重庆市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整个大后方亦名驰遐迩。只要提及其名，人们立刻会想到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国抗战、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们从切身的体验和耳闻目睹中了解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其他各军驻重庆办事处就是不同，其言其行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人民的要求，代表了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家都发自内心地喜欢它，信赖它。

人们对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如此厚爱和寄予重望不无道理。的确，这个办事处与其它各军驻重庆的办事处不一样，它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的办事处，而且还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杰出领袖人物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等，都曾长时间住在这里，为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不懈奋斗。194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亦住于办事处内。由于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和许多公开活动都用办事处的名义进行，人们因此只知重庆红岩有个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办事处，而不知道还有个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机关——南方局。办事处以中国共产党的化身和“小延安”、“小解放区”的形象存在于大后方人民的心中，并名扬中外。

在1939年至1946年这样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南方局依托办事处又直接领导办事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南中国地区的中共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积极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为深入发动大后方广大民众，建设坚强的中共党组织，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国共合作，团结各国友好，争取国际援助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对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社会进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局和办事处都是在时局坏转之时成立的，又都是长期在险恶的环境里展开并坚持各项工作的，而且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令广大人民称赞的成绩，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战斗历程，是抗战时期重庆光荣历史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非常光辉灿烂的一章。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

顾问 黄 冶

主任 张文彬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中文 刘崑水 李书敏 杨光彦

耿 聪 陶维全 徐朝鉴 蒋际华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湘 文履平 刘豫川 冯玉荣

李宗杰 杨从荣 陆大钺 陈贤义

罗传勛 周永林 周宗贤 郭培基

黄长军 彭伯通 蒲华清

《重庆抗战丛书》编辑室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编 辑 陶才祯 杨耀健 王建西

本书编写人员

主 编 王明湘

编写人员 刘立群 王明湘 王 泓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刘大年	1
自序·····	1
 第一篇 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诞生 ·····	 1
南方局、办事处在重庆成立·····	3
南方局、办事处的领导成员及机构设置·····	6
南方局、办事处的相互关系及其主要任务·····	10
 第二篇 维系国共合作 ·····	 13
坚持已有的合作关系·····	15
与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作斗争·····	20
同国民党长期进行谈判·····	59

第三篇 争取中间势力	95
与中间党派相互支持共进退	97
推动地方实力派积极投入抗日民主斗争	120
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帮助民族资本家进步	132
第四篇 壮大进步力量	144
加强大后方中共党组织建设	145
深入宣传教育群众	155
发展群众运动	160
第五篇 拓展国际交往	167
建立外事组加强对外活动	168
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支持	171
打破国民党垄断外交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	182
结束语	192
后记	194

第一篇

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诞生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1938年夏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欧洲，英国和法国惧怕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入侵，和德国签订了旨在牺牲捷克人民利益来保全自己的慕尼黑协定，使法西斯侵略战争在欧洲迅速蔓延。在东方，英国和美国也想仿效欧洲办法，积极酝酿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现实来换取与达成妥协，即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来达到既满足日本部分要求，又保护英美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基本利益的目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已从东北打到了东南，西向侵入到了华中腹地，要继续扩大在华军事进攻，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都遇到了严重困难。英美这时作“东方慕尼黑”之策划活动，自令日本政府窃喜，迅速作出呼应的反响。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即决定对中国再进行一场大规模战略性军事攻击，给中国当局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恐惧，给英美以更多些威胁后，再转而实施不战或少战而独霸全中国的计划，

达到以华治华，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于是，在1938年的10月里，日军集中大军先后攻占广州、武汉，打通了他在中国的南北交通运输动脉，切断了中国的海上补给线，不久又宣布封锁中国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自此以后，日本政府改变了侵华战略方针，由以军事攻击为主转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不断放出所谓“和平”解决日中战争、日中携手共同反共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空气；对英美进行的“东方慕尼黑”活动，亦采取积极敷衍态度。广州、武汉接连失守以后，日本的积极诱降和英美的积极劝降，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妥协投降主义嚣张起来，“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调充斥于国民党党政军内。汪精卫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很快公开投降日寇，还留在国民党内的投降派积极与汪逆配合鼓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虽然没有走汪精卫之路，仍在高喊抗战，也有一些战役布置，但其抗日立场已发生了严重动摇，调子已改变，已基本上持消极妥协的态度，还暗中与日本积极寻求妥协媾和办法。与此相反，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则加紧起来，以致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基本方针，还通过了一些反共防共的基本办法。中国的抗日战争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在这抗战时局的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全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旗帜，给全中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从理论上作了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在前线和后方努力为之奋斗。为了使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的工作适应时局的变化，在日益艰难的处境中更加坚决的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建立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同时决定在重庆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简称办事处）。

南方局、办事处在重庆成立

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成立经历了一段反复酝酿筹备的过程。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陷徐州后，沿陇海线西进展开进攻，造成了攻击武汉的有利条件。6月沿长江溯江而上，7月5日侵占控制长江和鄱阳湖水路的湖口，25日攻陷九江。接着，日军分5路直逼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虽有“保卫大武汉”之布置，实际上在积极准备撤退，武汉失守已成定局。武汉沦陷后，南方敌占区扩大，国民党统治区情况更加复杂，中共在中国南方地区工作的领导者思索着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在南方地区的工作，认为有必要调整党在该地区的中央局机构。193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致中共中央长江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议，在武汉失守后，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8月5日，中共中央复电长江局，认为项英关于南方党的组织改变的意见关系到长江局整个工作的部署，指示长江局讨论后再告中央决定。长江局于8月召开会议，讨论了武汉失守后南方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各方面工作，一致认为，为了利于工作的展开，有必要进行领导机构的调整，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和南方局。是月底，周恩来、博古、项英等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详细报告。中央书记处同意长江局关于中共在南方地区领导机构调整的意见，拟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又因武汉情况紧急，中共在武汉的机关和人员急需撤退，9月25日中央书记处急电留武汉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指示他们在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5个方面进行布置；东南局仍与新四军在一起，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及办事处一起准备入湘（湖南），党报委员会与八路军、重庆通讯处一起；董必武立即入川，凯丰在周恩来到达武汉

后入川，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暂留汉口。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了各地组织领导机构，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等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组织工作问题报告中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说：在新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组织几个中央局，如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由中央直接指导，并代表中央直接指导各地方党。”^①从这时起，周恩来已担当起领导南方局责任，并和博古、叶剑英等着手组建南方局。10月下旬，武汉沦陷，周恩来、叶剑英和部分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人员，随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撤至湖南再转广西桂林，12月中旬到达重庆。在这1个多月里，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名称、机关驻地以及管辖范围问题，周恩来、叶剑英与王明、博古间有过不同的意见，他们分别将提议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后，均未得答复。周恩来抵达重庆后，与有关同志商讨，大家都认为成立党的领导机关在即，否则将影响工作开展，遂致电党中央，请尽早决定。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西南局，以周恩来等13名中共在南方的领导人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随即电告周恩来等。7日，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延安，认为机关定名南方局较为名副其实；另鉴于南方局13位委员不常在一地，建议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吴克坚组成常务委员会。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等，同意南方局名称，机关设在重庆，以周、博、凯、吴、叶、董六人为常委。周恩来接电后，立即召集在重庆的南方局委员开会，宣布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讨论了委员们的组织分工，并于1月16日第一次以南方局的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第194页。

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南方局的组织分工情况。至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于同月成立，它与南方局一样经过了约3个月的酝酿筹备。早在1938年2月，八路军就在重庆市机房街70号设立了通讯处，周怡任处长。在武汉形势危急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清楚地知道重庆将成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已有在重庆设立办事处的打算，并从延安派出一部分人员经西安来重庆八路军通讯处。武汉撤退时，虽然中共中央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随周恩来入湘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考虑到重庆已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其地位在南方十分重要，也就从武汉办事处人员中派出一部分人溯江而上。这部分办事处人员于11月初抵达重庆后，即会同通讯处及延安来的人员，在董必武和周怡的领导下，开始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筹备工作。11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诸同志及重庆党团，提出为适应战况要求，宜在全国建立交通网，在重庆设办事处作为联络中心。电报说：“全国交通网请分西北、西南及海上三个中心：①西安任西北华北及中原之联络。②桂林任东南西南之联络。③香港联络沿海及海外。④重庆为三个联络中心，办事处移该处。”中共中央同意周、叶的意见，周、叶即指示钱之光在迅速处理好湘乡、衡阳的物资、人员的运送后赶往重庆筹备办事处。12月，钱之光经桂林、贵阳到达重庆，立即投入了组建办事处的工作。1939年1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原通讯处即行撤销。八路军办事处又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处长都是钱之光。在1939—1941年1月两年间，办事处在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联系时，依情况分别使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名义。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取消了新四军番号，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名义停止使用。所以，人们一般只知道重庆有个八路